

# 何處是歸鄉

## ——陶弘景墓所見葬式及其佛教影響

沈睿文  
北京大學

**摘要：**1986年，在江蘇句容朱陽館舊址附近發現了一批梁天監年間紀年的墓磚，其上銘文與北宋人發掘陶弘景墓穴所見相同，因而學者勘定這些墓磚出自陶弘景墓葬。在墓葬銘文磚中，除了紀年銘文磚之外，余者有文曰：太上道君之臣，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修上乘之六度，玄武延軀……《陶隱居內傳》載陶弘景“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隨侍他的有道士，也有僧侶。《南史·陶弘景傳》記載陶弘景在臨終遺令中說，其喪禮中要“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弟子遵而行之。發現的梁天監十八年墓磚銘文，證實並補充了文獻記載。上述銘文中，“勝力菩薩”是陶弘景奉佛自稱的號。“釋迦佛陀弟子”則因陶弘景自稱“勝力菩薩”便為釋迦牟尼弟子故。此外，其他銘文則體現了陶弘景的道教信仰。在體現陶弘景道教信仰的銘文磚中，“玄武延軀”反映了該墓葬使用一套四相鎮墓理論。本文在討論四相鎮墓法的基礎上，結合相關考古資料，探討了它對中古中國墓葬的影響。

**關鍵詞：**陶弘景、四相（靈）鎮墓法、范幼沖、宦官

茅山是中國道教名山，地跨江蘇省句容等縣，道教稱之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繼承上清經法，開創茅山宗的陶弘景（456–536）於南朝齊永明十年（492）上表辭祿，隱於茅山立館修道，至梁大同二年（536）逝世于茅山北部的朱陽館，其間居茅山達 40 餘年，死後窆於朱陽館東南約 200 米的雷平山，雷平山為茅山北部的一座小山峰。

1986 年，在江蘇句容朱陽館舊址附近發現了一批梁天監年間紀年的墓磚，其上的文字頗有一些與北宋人發現陶弘景墓穴所見相同<sup>1</sup>，因而這些墓磚被認為是出自陶弘景的墓葬<sup>2</sup>。該陶弘景墓葬形制已經不清，本文只能借助墓磚銘文提供的信息，結合歷史文獻對其葬式稍作分析。

## 一、銘文磚的分類

《陶貞白集》所錄《瘞劍履石室磚銘》雙行夾註云：“熙寧中，有狂人發先生（陶弘景）墓，於磚上隱起此銘。”其下記載的磚銘有：“華歸（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行大乘之六度，修上清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跡，遊太空而棲神”<sup>3</sup>。可見，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陶弘景墓已被盜發。

1986 年所見陶弘景墓銘文磚，有的是宋人未曾提到的，所見銘文磚按照內容主要可分為如下五類。

<sup>1</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東南文化》1987 年第 3 期，第 54–59 頁。

<sup>2</sup> [日] 麥谷邦夫著，孫路易譯《梁天監十八年紀年有銘墓磚和天監年間的陶弘景》，《日本東方學》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80–97 頁。

<sup>3</sup> [梁] 陶弘景《陶貞白集》，《金陵叢書》（乙集），蔣氏慎修書屋鉛印本，1915 年，葉四十正面至背面。

第一類，紀年類。文字內容有：“六年造甃”、“梁天監十八年”、“梁天監十八年造甃”、“梁天監十八年造甃十九”、“八年造甃十九年立虛塚”（圖1）。這些紀年磚，因銘文字多，書寫甚長，故在模印時，按磚頭側的長短，或印前幾字，或印後幾字，連起來看，原文是：“梁天監十八年造甃十九年立虛塚”<sup>4</sup>。這些紀年銘文磚是宋人未曾記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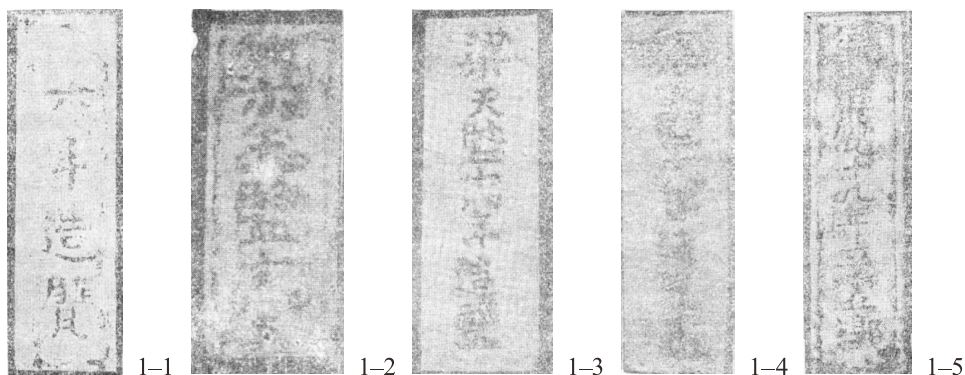


圖1：紀年銘文磚拓片（1-1 六年造甃，1-2 梁天監十八年，1-3 梁天監十八年造甃，1-4 梁天監十八年造甃十九，1-5 八年造甃十九年立虛塚<sup>5</sup>）

但從“六年造甃”的銘文磚來看，可知這些墓磚從梁天監六年（507）便開始製作了。換言之，陶弘景至遲自天監六年便開始籌畫自己的身後事了。這是陶弘景到茅山隱修的第15個年頭，離他仙化還有29年。

第二類，道教類銘文。文字內容完整清晰的有：“太上道君之臣”（圖2）。

<sup>4</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54-59頁。

<sup>5</sup> 圖1-1，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東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56頁圖16。圖1-2，第56頁圖1。圖1-3，第56頁圖2。圖1-4，第56頁圖3。圖1-5，第56頁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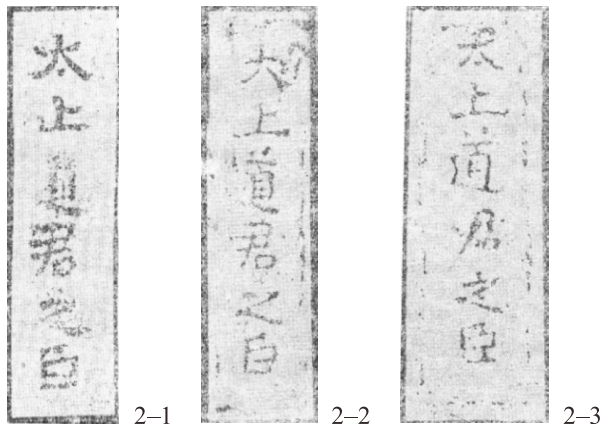


圖 2：“太上道君之臣” 銘文拓片<sup>6</sup>



圖 3：“太□” 銘文拓片<sup>7</sup>

由此可知，所出“太□”銘文磚（圖 3）其文應即“太上道君之臣”。

另一跟道教有關的銘文是“修上清□真”（圖 4），應即“修上清三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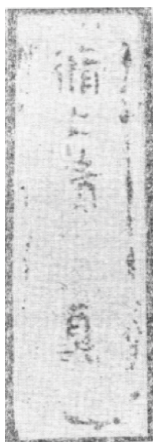


圖 4：“修上清□真” 銘文拓<sup>8</sup>

<sup>6</sup> 圖 2-1，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7。圖 2-2，第 56 頁圖 8。圖 2-3，第 56 頁圖 9。


<sup>7</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4。

<sup>8</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5。

《茅山志》卷五載：

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陶]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並盃、鏡各一而已。其墳甃甃環繞，相次成文，隱其甃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跡”、“遊太空而棲神”。書跡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羅]淳一後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1091），長樂林希子中所傳如此。<sup>9</sup>

而上引《陶貞白集》所錄《瘞劍履石室磚銘》云：“華歸（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行大乘之六度，修上清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跡，遊太空而棲神”<sup>10</sup>。結合陶弘景墓所出“修上清□三真”銘文磚，可知《茅山志》上引文中“□□□之三真”應作“修上清之三真”，而“修上乘之六度”應為“行上乘之六度”之誤。亦即這兩處墓磚銘文《陶貞白集》所載當是。

第三類，佛教類銘文，有“釋迦佛陀弟子”（圖5）、“勝力菩薩捨身”（圖6）、“上乘之六度”（圖7）。

<sup>9</sup> [元]劉大彬編，[明]江永年增補，王崗點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上冊第168頁。

<sup>10</sup> 《陶貞白集》（前揭），《金陵叢書》（乙集），葉四十正面至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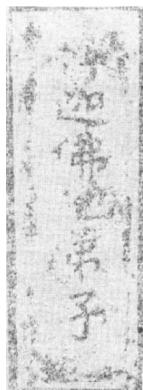


圖 5：“釋迦佛陀弟子”銘文拓片<sup>11</sup>



圖 6：“勝力菩薩捨身”銘文拓片<sup>12</sup>



圖 7：“上乘之六度”銘文拓片<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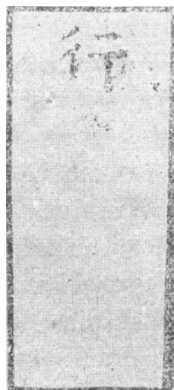


圖 8：“行\_\_\_\_\_”銘文拓片<sup>14</sup>

根據上文的考訂，圖 7 銘文應為“行上乘之六度”，圖 8 “行\_\_\_\_\_”銘文亦與之同。

第四類銘文為“華陽□□幽館”（圖 9），即“華陽隱居幽館”。《南史》稱陶弘景號為“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sup>15</sup>，“華陽隱居”是陶弘景自封的號。“華陽隱居幽館”則是陶弘景給自己墓塚取的名稱。

《茅山志》卷七載：

九代宗師，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宗元翊教真人，姓陶，諱弘景，字通明，吳荆牧浚七世孫，丹陽秣陵人也。生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永明十一年，乃拜表辭職，時年三十七。遂

<sup>11</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碑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1。

<sup>12</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碑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0。

<sup>13</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碑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2。

<sup>14</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碑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5。

<sup>15</sup> 《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879 頁。

來[茅]山，自稱“華陽隱居”，嶺西立華陽三館，上館建層樓，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梁武（帝）即位，彌加欽重，時人謂為“山中宰相”。<sup>16</sup>

前引《茅山志》卷八《稽古篇》稱“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而“隱居煉丹爐跡，在華陽上館”。所言“華陽上館”就是陶弘景在茅山嶺西所建三館之一，為貞白在世時隱修之居所。可見，“隱居幽館”是陶弘景墓所的專稱。



圖 9：“華陽□□幽館”銘文拓片<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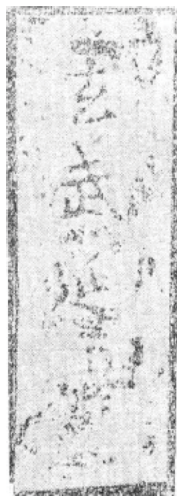


圖 10：“玄武延□”銘文拓片<sup>18</sup>

第五類銘文為“玄武延□”（圖 10）。下文對此將重點分析該銘文磚的意涵。

<sup>16</sup> 《茅山志》，上冊第 198-199 頁。

<sup>17</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6。

<sup>18</sup>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前揭），第 56 頁圖 13。

## 二、銘文磚所見葬式

《真誥》卷一〇《協昌期》第二<sup>19</sup>云：

青龍秉氣	夫欲建吉塚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塚墓百忌害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塚，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
上玄辟非	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塚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塚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禁萬忌，一皆厭之，必反
玄武延軀	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塚，不足宣也。（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塚裏，正取中心為數
虎嘯八垂	也。但辟非應是朱鳥而云塚後，若徵家[塚]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家[塚]庚向，朱鳥在東北，所不論耳）

可知，圖 10 銘文“玄武延□”應即“玄武延軀”<sup>20</sup>。根據《真誥》上引文的記載，可以判斷這是一套四相葬墓之法，為道教上清派特有之鎮墓方式。“上玄辟非”，既是四相中一相之名，亦取以為整個這種葬法的總名。<sup>21</sup>

那麼，《真誥》上引文中“辟非”為何？深圳望野博物館收藏的大

<sup>19</sup> 《真誥校注》，[日]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31頁。按，引文中的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sup>20</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5冊第1476頁。

<sup>21</sup> 上揭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第5冊，第1476-1479頁。





圖 11：翟門生棺床屏風“此名辟非守”屏風原石及拓片<sup>22</sup>

魏武定元年(543)十一月廿三日翟門生棺床屏風的圖像及銘文給我們明指(圖 11)。

該屏左側圖像題銘為“此名辟非守”，同時可知“辟非”所指的圖像為何。梳理一下，該圖像尚見於鞏縣石窟 3 號窟後壁(圖 12)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墓室南壁墓門上方<sup>23</sup>(圖 13)、以及山西忻州九原崗北齊壁畫墓甬道頂部<sup>24</sup>(圖 14)，而更早的圖像則見於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sup>25</sup>後室的門楣上(圖 15)。這三處“辟非守”的圖像都位於墓室進口處上方，可知“辟非”之意在於“守”。

<sup>22</sup> 圖 11 改自趙超《介紹胡客崔門生墓門志銘及石屏風》，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 681 頁圖 5。

<sup>23</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0 期，第 24 頁圖 36。

<sup>24</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齊壁畫墓》，《考古》2015 年第 7 期，第 51-74 頁。按，該墓的年代應以北齊早期為宜。此另文討論。

<sup>25</sup> 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年，第 14 頁，圖版 29 第 8 幅。



圖 12：鞏縣石窟 3 號窟後壁  
（筆者攝）



圖 13：北齊徐顯秀墓墓室南壁墓門上方<sup>26</sup>



圖 14：忻州九原崗北齊壁畫墓甬道頂部<sup>27</sup>



圖 15：沂南漢畫像石墓後室墓門  
橫樑左側細部<sup>28</sup>

<sup>26</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前揭），第 24 頁圖 36。

<sup>27</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前揭），第 72 頁圖 55。

<sup>28</sup> 改自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年，圖版 29 第 8 幅。

在古代中國的壁畫墓中，所繪朱雀的位置與上舉三墓例相近，或在墓室入口的一側，或在墓道北壁，恐多少也有“守”的用意在。這一點，從後世的華蓋宮文和敕告文有將“上玄辟非”稱作“朱雀辟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證明。

對范幼冲所言的“上玄辟非”，陶弘景在其後批語云：“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辨。又以朱鳥為上玄，亦所未詳也。”意思是范氏所言的四靈鎮墓，雖然與墓法所載相同，但四靈的具體形相，以及為何范氏用“上玄”代替南方傳統慣用的“朱鳥”，這些連陶弘景都不甚了了。從考古資料來看，此處的“上玄”有可能是指“九天玄鳥”。

199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在南昌火車站廣場清理一處東晉時期的家族墓地，共發掘了6座墓葬，其中M2出土一彩繪木胎漆圓盤形器<sup>29</sup>（圖16），直徑21.4釐米，所繪圖像，“其中兩鰐左右相對橫臥於盤中，將圖案分成上下兩部分。鰐長尾八足。其上左側為西王母和九天玄女。西王母頭戴方冠，面頰豐腴，手撫琴瑟。九天玄女人面鳥身，頭戴冠飾，面龐清秀，雙翅微張，尾羽長曳，面對西王母而立，作聆聽狀。圖案下部中間繪一虯龍，左右各有一風廉。虯龍獨角大眼，有耳，張嘴吐舌，揚首向上，身形隱沒於雲紋之中，露四足；風廉豹頭環眼，兩耳，四足，長尾，作奔馳狀，氣勢威猛。風廉下繪一神獸。此外還繪有青鳥及蒼草紋，青鳥身飾圓點紋。”<sup>30</sup>這是目前所知考古發現僅有的一件九天玄女畫像，也是

<sup>29</sup>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火車站東晉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2期，第12-41頁。

<sup>30</sup>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火車站東晉墓群發掘簡報》（上揭），第16頁圖8。



圖 16：南昌火車站東晉墓群 M2 所出彩繪木胎漆圓盤形器線圖<sup>32</sup>

考古發現中時代最早的一件確切可靠的九天玄女材料<sup>31</sup>。

該墓地發掘的 M3 為東晉永和八年(352)七月南昌縣令雷陔夫婦合葬墓，其墓為前後室磚墓，前室兩側可見有雙耳室痕跡，推測其平面形制應為“十”字形。雷姓是兩晉時期南昌地區的世家大族，雷陔可能是東晉命官。其墓葬出土衣物疏木方有“永和八年七月戊子朔五月壬辰江州鄱陽郡鄱陽縣都□□□□□□南昌縣令雷陔命婦鄱陽年八十六即醉酒□□□□□□身喪”之語，並出“弟子雷陔再拜 問起居 鄱陽字仲之”之名刺木簡，皆屬道士或道教信眾的葬儀用品。南昌火車站這 6 座東晉墓葬的墓主及其家人的宗教信仰，皆與道教有關。這和上述 M3 所出漆盤畫像內容性質也是一致的<sup>33</sup>。這說明東晉雷陔

<sup>31</sup> 張勳燎、白彬《江西、四川考古發現的九天玄女材料和有關文獻記載的考察》，同氏《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4 冊第 1004-1005 頁。

<sup>32</sup>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火車站東晉墓群發掘簡報》(上揭)，第 16 頁圖 8。

<sup>33</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4 冊第 1004 頁。

家族為奉道世家，有著共同的道教信仰。

東晉道教靈寶派產生之後，九天玄女似乎成為該派一位重要的道教女神<sup>34</sup>。九天玄女以兵戰伏魔為能事，為主戰降魔伏妖之神，有鎮妖滅邪之神威<sup>35</sup>，正合乎“守”的功能。它進入葬墓知識系統恐跟九天玄女成為靈寶派一位重要的道教女神有關。靈寶派，亦稱閣皂宗、葛家道。由漢末晉初的葛玄（約164–244）創立，活躍於江南一帶，尤盛於江西地區，本山為閣皂山。南昌距離靈寶派聖地閣皂山不遠，應在靈寶派影響範圍之內，如此雷陔家族很可能世為道教靈寶派信眾<sup>36</sup>。這應該是雷陔家族墓群 M2 所出漆盤繪有九天玄女的原因。

那麼，這種葬法意在何為？《真誥》卷四《運象篇第四》載：

若其人暫（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沉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真人煉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

趙成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

夫得道之士暫游于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掾]（錄）氣。

<sup>34</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4冊第1030頁。

<sup>35</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4冊第1018–1026頁。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真經》後服五石腴事。<sup>37</sup>

《真誥》卷四《運象篇第四》載：

保命告云：“許子（掾）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於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覩（睹）我於東華矣……”<sup>38</sup>

稍晚的《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八《自知升過功德訣第三十六》所載與此同，且更為詳盡：

上學積年，必與眾異，精識妙解，久應出群。德雖未備，所作必知。知其生來，自少及長，動靜之為，有善有惡。惡者悔與不悔，善者積與不積，多少隱顯，分別識之。道足乎心，術足乎驗，體應糜散，心神當知。功行濟世，一死一生，次者三死三生，又次五死五生，又七死七生，又九死九生。品應此者，死不須悲，當克日時，與眾分別。經圖付授，各得其人。躬所佩帶，悉還本師；師已升度，付洞及淵。所居所服，付物生資，約敕子孫，爰及弟子，貨營齋請，五煉鎮尸。尸後更生，生或托胎，化生之由，由於先德，加以鎮煉，施散立功，功轉必速，與道合同。若不及此品，十死十生，百死百生，千死千生，萬死萬生，子子孫孫，為之齋請，布惠行仁，常存拔度矣。若心同上品，術異五條，或身神俱去，或劍杖代留，有隱有顯，垂軌立譽，出經制法，廣濟後生，不假令人，為其齋請也。

<sup>36</sup> 按，張勳燎、白彬認為雷陔為奉五斗米道的俗家弟子。不過，他們又認為雷陔家族墓地 M2 所出彩繪木胎漆圓盤所繪九天玄女跟道教靈寶派有關。詳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4 冊第 1026、1030 頁。

<sup>37</sup> 《真誥校注》，第 321 頁。

<sup>38</sup> 《真誥校注》，第 154 頁。

上學之曹，身神未得俱去，運應轉輸，皆用捨身之術。煉神上升，留尸下瘞。瘞之卜地，同墓凡人，不駭於俗，是謂和光。至於密法，潛候山川，施置會神，鎮尸不朽，朽即又生，終與神合。天地不偏，靈祇歸一，地有青龍秉氣，色（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則藏尸少時，枯骸更肉，凋藏生華，瘞形又鬱，先神後身，混合為一。煉易之妙方，成真之要術，精能遵行，福流萬葉矣。

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

欲建吉塚之法，去魂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塚墓百忌，害炁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家，招搖欲隱，起九尺（庶人五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之入土三尺。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能明吉凶，識四相哉？辟非之下，塚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塚墓之患，能知鎮墓之法，千禁萬忌，一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塚，不可宣也。

右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塚中王炁、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帝王公侯官、生民男女甲乙，年如千歲，生值清真之炁，尸歸神宮，翳身冥卿（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諸忌，不得妄為害炁，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立塚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鎮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吉。范幼沖，漢時尚書郎，解地理，乃以塚宅為意，魏末得道。在童幼中，其云：“我今墓有青龍秉炁，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煉形體之所歸，乃上吉塚也。”<sup>39</sup>

<sup>39</sup> 撰人不詳《洞真太上太霄琅書》，《道藏》（張宇初 [1359-1410]、張宇清 [1362-1427] 編，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可見，上清派中四相（靈）的作用在於太陰煉形，鎮尸不朽，朽即又生，終與神合。該葬式實為五煉鎮尸、鎮墓之法。

《真誥》是陶弘景在公元 499 年編纂而成<sup>40</sup>，但實際上主要反映公元四世紀中期以前上清派早期的活動情況。這種鎮墓方式既然被判為道教上清派所特有，但如果漢代墓葬中就有四靈鎮墓的傳統，又該怎樣看待這種漢魏既有的傳統與六朝上清派之間的關聯？《真誥·協昌期》同時提到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范幼沖，很可能是范氏把這套四相鎮墓的理論從中原帶入江東的。

《真誥》卷一〇《協昌期第二》載：

范幼沖，漢時尚書郎，善解地理，乃以塚宅為意，魏末得來（得道？）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乘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煉形之所歸，乃上吉塚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鳥為上玄，亦所未詳也）<sup>41</sup>

文中所謂“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便即《真誥》該卷在前面所載：“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

---

年），第 33 冊，第 692 頁上欄至第 693 頁上欄。按，張勳燦、白彬認為《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年代略晚於陶弘景，材料出自《真誥》。詳同氏所撰《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5 冊第 1479 頁。

<sup>40</sup> 劉屹《道教仙人“子明”論考》，收入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509-520 頁；此據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62-163 頁。按，王家葵認為《真誥》的撰著年代約在齊建武年至永元元年（496-499）之間。詳所撰《陶弘景叢考》，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第 204-222 頁。

<sup>41</sup> 《真誥校注》第 330 頁。按，“得來”張勳燦、白彬作“得道”，詳所撰《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5 冊第 1476 頁。



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縊。”<sup>42</sup> 如上所述，在陶弘景墓磚中，有一塊刻有“玄武延軀”字樣，證明陶弘景本人的墓葬也確實使用了范幼沖所說的四相鎮墓法。范幼沖本是遼西人，曾做東漢末年的尚書郎，曹魏末年從中原來到江東，自稱其墓穴有四相守衛，是上吉之塚。雖然《真誥》有關他最終成仙之說不一定可信，但在漢末至永嘉時期，的確有一批中原修道人士因避難來到江東，為江東帶來一些中原的文化傳統<sup>43</sup>。這在考古工作中也有所發現。

1957年發掘的南京萬壽村一號墓<sup>44</sup> 應該是所見陶弘景之前使用四相鎮墓法的墓葬。該墓葬為凸字形拱頂墓，其前有短甬道，平面形制同南京新寧磚瓦廠一號墓（圖17）。根據萬壽村一號墓所出墓磚銘文“永和四年十月城陽炁氏”（圖18），可知其年代在東晉永和四年（348）。

墓中所用磚的紋飾較複雜，其平面多印繩紋，其中有的磚在一側或兩端印有斜十字和蓮瓣組成的圖案，龍、虎、獸面、菱形幾何紋等幾種，尤以龍和虎的紋飾較為特殊，龍紋分印在兩塊磚的側面，磚上並印有反書陽文的“龍”字。虎紋則為分印在三塊磚的磚端，由三磚合成完整的圖案，在圖案四角印有“虎嘯丘山”四字<sup>45</sup>（圖19）。

“虎嘯八垂”之“垂”本意為邊陲，同今“陲”字。而古“陲”字本意為危，是指高聳驚人的山崖。這裡直接將“八垂”替換成其本意“丘山”。這種文字上的差異，恰如同後世的華蓋宮文和敕告文中將“玄武延軀”寫作“真武延軀”；而“青龍乘氣”、“虎嘯八垂”

<sup>42</sup> 《真誥校注》第309頁。

<sup>43</sup> 劉屹《王凝之之死與晉宋天師道的淵源》，《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74頁。

<sup>44</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5期，第232頁。

<sup>45</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23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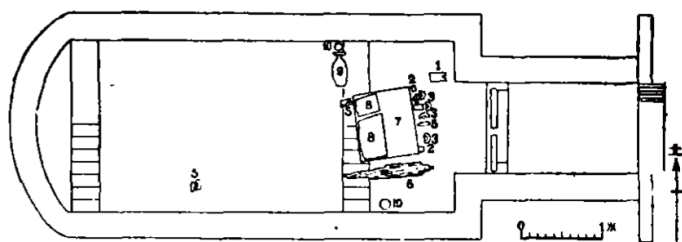


圖 17：南京新寧磚瓦廠一號墓平面圖<sup>46</sup>



圖 19：南京萬壽村一號墓之“虎嘯丘山”畫像磚<sup>47</sup>



圖 18：“永和四年十月城陽昺氏”銘文磚拓片<sup>48</sup>

<sup>46</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 231 頁圖 1。

<sup>47</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 232 頁圖 2-4。

<sup>48</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 232 頁圖 2-1。

分別作“青龍居左”、“白虎守右”。南京中華門外六朝墓葬中的平頂墓和穹窿頂墓都是北方漢至魏晉墓葬常見的形式<sup>49</sup>，萬壽村一號墓便正好位於該墓葬群之中。

上述銘文磚稱墓主為“城陽炁氏”，典出炁氏的先祖炁橫，漢明帝時為城陽太守。城陽為今河南濮陽。這表明墓主為南來北人，亦即是南下的北方移民。這也是南京萬壽村一號墓所出獸面形象（圖 20）為北方樣式的原因。由此或可進一步判斷南京中華門外六朝墓葬為南來北人的墓葬區之一。



圖 20：南京萬壽村一號墓之獸面畫像磚<sup>50</sup>

前引《真誥》云：“侯王之家，招搖欲隱，起九尺（庶人五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之入土三尺。”前述陶弘景墓及南京萬壽山一號墓就是“題其文”——即畫像磚銘文，而作為墓磚的形式與“埋之入土三尺”大同。

佛教影響與佛教磚銘的出現陶弘景雖繼承《上清》經法，開創茅山宗，但他博覽兼通儒、釋、道墳典，主張三教融合。華陽隱居幽館佛教銘文磚的出現正是他受到佛教影響的體現。作為道教的一代宗師，陶弘景始終站在道教的立場，以道教之“道”來融攝儒、釋，

<sup>49</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 236 頁。

<sup>50</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六朝墓清理簡報》（前揭），第 232 頁圖 2-5。

“總括三教，與道合一”<sup>51</sup>。實際上，陶弘景對佛教的處理方式，也是六朝時期面對佛教知識，傳統的儒家和道教採取的共同策略的縮影，此已為學界共識，茲不贅述。

《梁書·陶弘景傳》載，陶弘景“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某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sup>52</sup>。《茅山志》卷七亦載：

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於爐燧。七年，以為林岩淺近，復思遠遊，乃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幃山，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住大若岩，修所著《真誥》。復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武帝有敕，迎還舊山。因詣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攝戒。既歸，入住東澗。明年冬，徙朱陽館，又移鬱岡齋室。先生山世所著書二百余卷，弟子受經法者三千餘人。<sup>53</sup>

梁蕭綸(507-551)《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云：

[陶弘景]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啟聞，蒙敕許可。<sup>54</sup>

陶弘景佛道雙修，在茅山道觀中建佛道二堂，隔日朝禮。法琳(572-640)《辨正論》卷八《歷代相承篇第十一》引《陶隱居內傳》云：

<sup>51</sup> 相關研究可參劉永霞《陶弘景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22頁。按，王家葵認為陶弘景對佛教的態度是逼迫之舉。詳所撰《陶弘景叢考》（前揭），第15-40頁。

<sup>52</sup> 《梁書》卷五一《陶弘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43頁。《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第1899頁。

<sup>53</sup> 前揭《茅山志》，上冊第198-199頁。

<sup>54</sup> [梁]蕭綸《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八七三，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605頁下欄。

“[陶弘景]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sup>55</sup> 隨侍他身邊的有道士，也有僧侶。

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六《內異方同制旨》載茅山道士沖和子與陶弘景：

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岩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按，《璿璣抄文》，沖和子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采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sup>56</sup>

唐釋玄嶷（活躍於 684–704）《甄正論》卷下云：

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於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於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于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於今不為鳥雀所污。<sup>57</sup>

《南史·陶弘景傳》載陶弘景臨終遺令：

<sup>55</sup> [唐]法琳《辯正論》卷六，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纂《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略作《大正藏》，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重刊入《電子佛典集成》，臺北：1998–2018年）編號 2110，第 52 冊，第 535 頁中欄第 1–2 行。又見於[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三，《大正藏》編號 2103，第 52 冊第 185 頁中欄第 24 行。按，現存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中無此內容。學界一般認為該內容如果不是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缺掉的部分，則表明有可能是曾經有過已亡佚的同名書籍。詳續昕《道教建築的藝術形式與美學思想》，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93 頁註腳 4。

<sup>56</sup> [唐]法琳《辯正論》卷六，《大正藏》第 52 冊，第 534 下欄第 3–10 行。又見載于[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三，《大正藏》第 52 冊，第 185 頁上欄第 16–23 行。

<sup>57</sup> [唐]釋玄嶷《甄正論》，《大正藏》第 52 冊，第 568 頁下欄第 19 行至第 569 頁上欄第 1 行。

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襪冠巾法服。左肘录（策）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佛教徒）道士（道教徒）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sup>58</sup>

弟子遵而行之。《梁書》本傳亦稱“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sup>59</sup>。

“勝力菩薩”是陶弘景奉佛所自稱的號。他借夢說自己是由佛所授，宣稱自己前生是佛弟子勝力菩薩投胎下凡來度眾生的。陶弘景既自稱“勝力菩薩”，便為釋迦牟尼的弟子，故書寫磚文“釋迦佛陀弟子”。

可見，1986年再次發現的陶弘景墓磚銘文，證實並補充了上述文獻記載。

### 三、陶弘景葬式對後世的影響

陶弘景墓葬以道釋銘文磚修築，實際上是南朝梁時墓葬營造的時代特點，並非陶弘景的獨特創造<sup>60</sup>。儘管陶弘景在其華陽隱居幽館中營造了釋道的宗教氣氛，從目前所見考古資料來看，陶弘景葬式對後世的影響還是主要體現在其道教因素。具體表現在如下兩方面。其一，四相鎮墓法。其二，鐵索懸棺的葬式，這見於後世宦官墓中。這顯然跟陶弘景在道教中的巨大影響力是分不開的。

1964年，河南扶溝縣發掘了一座約在開元、天寶年間（712–756）

<sup>58</sup> 《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第1899–1900頁。

<sup>59</sup> 《梁書》卷五一《陶弘景傳》，第743頁。

<sup>60</sup> 按，此另文探討。

以前的唐代趙洪達墓，為單室磚墓，夫妻合葬<sup>61</sup>（圖 21）。其中見一敕告文，圍繞中間九行敕告文四周的“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圖 22）系用雙鉤楷書刻寫。四方十六字與中間敕告文之間無框欄相隔，另在每方四大字之外靠石邊外分別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像與銘文內容相應，這是川西兩宋墓出土材料所沒有的<sup>62</sup>。這方墓誌雖然沒有銘刻絕對年代，但是從墓葬出土陶俑等器物的形制來看，其年代應為唐代開元天寶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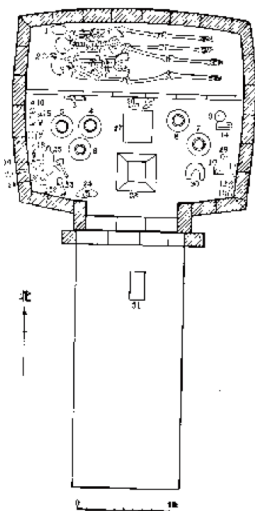


圖 21 墓室平面圖  
1. 葬神 2. 葬所 3, 11-13, 16-20 附圖 4-9 附圖  
10. 附圖 14. 附圖 24. 附圖 25. 附圖  
26. 附圖 27. 附圖 28. 附圖 (并刻) 29. 附圖  
30. 附圖 31. 附圖



圖 22：唐趙洪達墓敕告文<sup>64</sup>

圖 21：唐趙洪達墓平面圖<sup>63</sup>

<sup>61</sup>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扶溝縣唐趙洪達墓》，《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6~388頁。

<sup>62</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5冊第1473頁。

<sup>63</sup>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扶溝縣唐趙洪達墓》，《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6頁圖1。

<sup>64</sup>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扶溝縣唐趙洪達墓》（前揭），第387頁圖2。

趙洪達墓出土 2 方敕告文，皆為正方形。出土於墓室的中部。其中一方有蓋，但敕告石及蓋上均沒刻文字；另一方僅存敕告石，石長 36、寬 38、厚 8–10 釐米，製作很不平整。其上刻文字 9 行，每行 12 字。其敕告文曰：

天帝告主（土）下塚中王氣、四方諸  
神、趙公明等：唐國許州扶溝縣  
□川公趙洪達，四十；夫□□  
氏年七十二。生直清真之  
氣，死歸神宮，驛身冥卿（鄉），潛守  
沖虛，辟斥（斥）諸禁忌，不得忘為  
害氣。當令子孫昌燠，文咏九功，  
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  
無窮。一如主（土）下九天律令！𠄎𠄎<sup>65</sup>

“𠄎𠄎”是該敕告文石刻與《真誥》淵源關係最好的證據<sup>66</sup>。此外，川西宋墓中所見“華蓋宮文”和“天地敕告文”也是在此影響下的產物。對此，張勳燎、白彬已有論述<sup>67</sup>。

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陶弘景墓被盜發後，成為後世修道之人探幽尋訪的一處勝跡。北宋元祐初在山中學道的宦官羅淳一便曾專門至此探尋。而鐵索懸棺葬式在宦官群體中的出現，很可能跟羅淳一習自華陽隱居幽館有關<sup>68</sup>。《茅山志》卷五載：

<sup>65</sup> 按，趙洪達敕告文據上引《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八《自知升過功德訣第三十六》文補。詳《道藏》，第 33 冊，第 692 頁下欄至第 693 頁上欄。

<sup>66</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5 冊第 1480 頁。

<sup>67</sup>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前揭），第 5 冊第 1452–1472 頁。

<sup>68</sup> 邵磊《明代宦官楊慶墓的考古發掘與初步認識》，《東南文化》2010 年第 2 期，第 62–63 頁。



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陶]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並盃、鏡各一而已。其壙甃甃環繞，相次成文，隱其甃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跡”、“遊太空而棲神”。書跡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羅]淳一後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1091），長樂林希子中所傳如此。<sup>69</sup>

《茅山志》卷七載：

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閻等，即日尸解，年八十一。屋中香氣積日不散。敕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虛柩於雷平山。先生神儀明秀，盼睞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眾矣。嘗言心中恆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滯礙。紫陽王君曰：“陶公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冲等也。”趙丞曰：“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按此乃乙未年中事，見《周氏玄通記》，後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當更升也。<sup>70</sup>

又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載：

以梁大同二年丙辰三月十二日癸丑解駕違世。其曰：詰朝，做告逝篇示其門人。其篇云云具集中。

巳時恬然乃去，支體柔弱，顏色不變，異香奇靈繚繞山谷，將斂乃見空衣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

<sup>69</sup> 《茅山志》，上冊第168頁。

<sup>70</sup> 《茅山志》，上冊第199頁。

但冠劍及空衣存耳。

十四日窆靈柩于雷平山。<sup>71</sup>

“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sup>72</sup>。看來很可能陶弘景的弟子只是在隱居幽館中鐵索懸棺，棺中置劍，並盂、鏡而已，“留舄表化，棄劍凝神”，造成一個尸解升仙的狀態。這應該是上引文中稱“窆虛柩”以及所謂“空衣變解之道”的內情，亦即陶弘景最終並未葬于華陽隱居幽館之中，而是出於保密、保護尸體等原因葬于雷平山他處。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存在。北宋元祐年間羅淳一在山中修道，因為宗教信仰的力量<sup>73</sup>，見此情景誤以為是陶弘景尸解，便依此來安排自己的葬事。因為羅淳一的宦官身份，該葬式也就浸潤成為後世宦官墓葬的一種形式。

目前考古所見，使用鐵索懸棺葬式的主要為明代宦官<sup>74</sup>，有楊慶（葬於宣德五年，1430）、洪保（葬於正統 [1436–1449] 末年）、牛玉（葬

<sup>71</sup> 《道藏》第5冊，第508頁下欄至第509頁上欄。

<sup>72</sup> [梁]蕭綸《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茅山志》卷一二，上冊第304頁。

<sup>73</sup> 如，宋元祐年間道士輩以墓碑銘文為符文，並摹寫以示世人。按，1993–1994年，羅宗真兩度至茅山訪古，在朱陽館舊址以西，發現許多農舍牆壁上，嵌砌了不少模印的銘文磚。他認為梁天監十八年仍當陶弘景在茅山傳道之時，這些銘文磚發現地點距離華陽館和陶弘景死後所葬雷平山都很近，它們很可能是華陽館或朱陽館或乾元觀等道觀建築上的用磚，或為陶弘景死後以及其弟子等道眾之類人物的墓碑。詳羅宗真《道家學者陶弘景有關遺物、遺跡的考證》，《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2，第83–84頁。

<sup>74</sup> 按，迄今尚未在宋代宦官墓中發現類似葬式。這是今後考古、研究工作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於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及趙芬（北京工商大學 M1）等<sup>75</sup>。這些宦官所用的墓葬等級都比較高，多為前後雙室磚墓，其中北京市香山南路石景山射擊場 M4 更是仿明帝陵結構。他們以陵寢為死後繼續修煉之所，如北京工商大學 M1（趙芬墓）後室石門額便直接刻銘：“養性洞”，這進一步表明鐵索懸棺的葬式跟宗教的關聯。遺憾的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尸解得道成仙，同樣空留一具枯骨。

---

<sup>75</sup> 詳邵磊《明代宦官楊慶墓的考古發掘與初步認識》，《東南文化》2010年第2期，第52-64頁。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南京大學《南京市祖堂山明代洪保墓》，《考古》2012年第5期，第41-52頁。保定地區博物館《明兩京司禮太監牛玉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2期，第76-80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學明代太監墓》，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許志強《南京三座明代宦官墓葬的發掘與認識》，《東南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74頁。按，南京這三座墓葬的年代相當，其中可知 M3 營建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左右，葬於明弘治七年（1494）。